

复国之路

虽然在两千年漫长的流散岁月中，犹太人一直没有忘记故土，祈祷着“明年在耶路撒冷”，但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才真正踏上了返乡复国的道路。这一时期兴起的犹太复国运动，是现代犹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开端。

19世纪是一个犹太人的希望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西欧犹太人经历了对他们的“解放”，以及因这种“解放”而刺激起来的新的反犹浪潮。而东欧的犹太人不仅未能品尝“解放”的滋味，反而在沙皇政权的暴政下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之中。犹太人在经历了新的希望和失望，新的喜悦和痛苦之后，一种形式独特的民族主义也在他们中兴起，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的两个主要步骤是：一、鼓励和帮助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二、争取大国对建立犹太国家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重要的转折点。英国发表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得到一个大国的支持。此后，一批又一批犹太人向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移居，使当地犹太社团不断发展壮大。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雏形逐渐显现。

一、复国思想的产生

一方面是无情的屠杀和迫害，另一方面同化又不被接受，不少犹太人对此深感痛苦。如果说，对于中世纪那种野蛮粗暴的歧视和迫害，犹太人还能用宗教拯救的思想来进行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并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后品尝到自由之果的近代犹太人，是不愿再对新的反犹浪潮逆来顺受了。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进行思考，犹太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周而复始、层出不穷的反犹浪潮？

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犹太知识精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国家！古代犹太人曾经在巴勒斯坦有过自己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灭亡了，今天要永久性地解决当代犹太人问题，就必须重新恢复犹太人的国家！这种恢复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思想，就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称“锡安主义”，它得名于被视为犹太圣山的耶路撒冷城外的锡安山。

近代第一位从政治上提出犹太复国理论的人是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赫斯。他出身于波恩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年轻时也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赫斯还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过密切的交往。欧洲革命失败后，为了逃避当局的迫害以及由于政治见解的分歧，他流亡到了国外并脱离了政治活动，潜心学术研究，也关注和研究犹太人问题。

1862年，赫斯在科隆出版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他在本书中认为，犹太人问题已成了欧洲最后的民族问题；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彻底摆脱反犹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返乡复国”，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复建立古代的犹太国家。他写道：“每一个犹太人，不管是

否愿意，在血统上都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他还提出，这个犹太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实行土地国有和合作生产，将成为亚非被压迫民族的榜样。

摩西·赫斯不仅是最早提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人，而且他还大胆地将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结合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正处于一个低潮时期，再加上他也未能使犹太人返乡复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办法，因此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摩西·赫斯 (1812-1875)

1881年俄国的反犹浪潮，刺激着每一个东欧的犹太人的神经。许多人也在思考着犹太人的出路：是逆来顺受？是改宗同化？还是远走他乡？敖德萨的一位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在目睹了沙皇政府排犹屠犹暴行之后，于1882年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自我解放》中分析道，反犹主义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变态，其原因就是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国民众的嫉恨，而犹太人没有自己国家的状况又使他们很容易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压，犹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特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来消除这种原因。犹太人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过上一个正常民族的生活。

与摩西·赫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国家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他主张召开俄国全体犹太人大会议，商议购置一块土地，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并争取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开始时并不强调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犹太人并不是“需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虑

在北美或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获得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平斯克就发现，只有把巴勒斯坦作为建国的目标，才能激发起广大犹太人的感情动力。于是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成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领导人。

尽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产生的影响比赫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读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响而组织起来移居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数量不多，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小团体行动。

19世纪后期，除了摩西·赫斯和列奥·平斯克，还有一批犹太思想家也提出了类似或相近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如卡利舍尔拉比的宗教复国理论、斯摩棱斯金的民族复兴理论、比恩鲍姆的政治—宗教学说、阿哈德·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等等。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么多的犹太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对犹太民族的前途进行思考和探索，提出了相近或相似的理论学说，既说明了当时犹太人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证明了犹太复国运动兴起的必然性。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书的影响，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Hibbat Zion）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将巴勒斯坦作为定居复国的目标之后，他被邀请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

勒斯坦定居。大会还决定在华沙和敖德萨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后来，“锡安山热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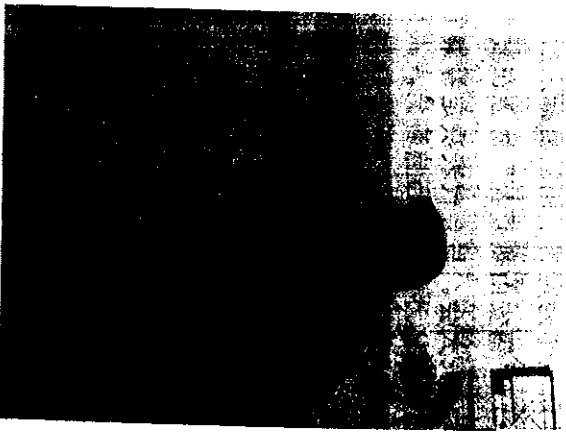
1882年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一批犹太移民

又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

“热爱锡安山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后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20世纪前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早期几乎都参加过“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活动。

二、赫茨尔和他的《犹太国》

尽管赫斯和平斯克较早就提出了犹太人返乡复国的思想，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的影响有限，并没有得到普遍的传播，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反响。真正使犹太复国主义形成完整的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是西奥多·赫茨尔。



赫茨尔于1860年5月2日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里。他在那里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他18岁时全家迁到了维也纳，所以后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赫茨尔自幼爱好文学，但在他父亲的坚持下，他大学时学的是法律，并且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而，他后来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是进行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1891年，他受聘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

西奥多·赫茨尔

对于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并接

受德国式世俗教育的赫茨尔来说，反犹太主义对他早年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后来他读了一些反犹书刊，看到了身边的一些反犹活动，这个问题才逐渐引起了他的关注。但在开始时，他仍主张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人问题。他曾倡导犹太人受洗成为基督教徒，鼓励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

1894年，赫茨尔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德雷福斯案件。遍及法国的反犹浪潮使赫茨尔感到非常震惊，他原来的“同化”信念被彻底动摇了。他后来认为，正是德雷福斯案件使他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激愤之余，赫茨尔开始从新的角度来探索犹太人问题。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地、有效地消除反犹太主义？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被这个问题缠绕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从它进入我的生活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天，许多个星期。它一直充溢着我的思想，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它总是跟随着我，它总是影响着我的谈话。当我从事我必须干的、可笑的、琐碎的记者工作时，它总是在我身注视着。它使我不得安宁，使我无法摆脱。”

他经过不断的思索，分析，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种清晰的想法，这就是，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要永久性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唯一办法就是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他开始在一种冲动的激情中写作他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一连许多天，他奋笔疾书，把喷涌而出的思想写到纸上。当冷静下来之后，他又对这个在感情冲动中写出来的小册子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于1896年2月在维也纳正式发表。这就是他伟大的著作《犹太国》。

《犹太国》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嘲笑它是“一个被犹太狂热症弄得精神错乱的人的痴心妄想”；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犹太人的乌托邦；也有许多人反对它，尤其是那些主张“同化”的上层犹太人，他们认为它将会使反犹太主义加剧；还有的人称赫茨尔企图当犹太人的国王或首相；然而，《犹太国》却受到了下层犹太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由于新闻检查，《犹太国》很难进入当时犹太人最集中的俄国和东欧。但是当这些地方的犹太人知道了赫茨尔和他写的小册子后，他们把他欢呼为来从苦难中解救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把

《犹太国》称为一次神的新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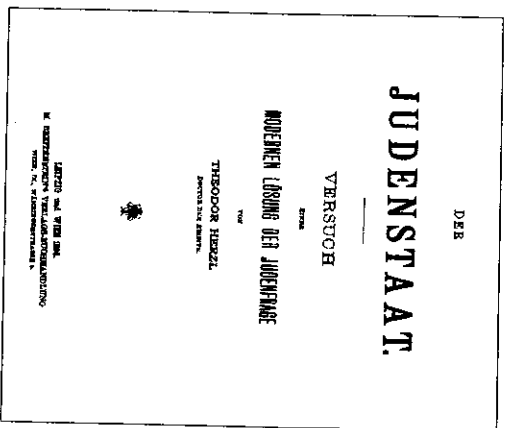
赫茨尔在提出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之前，并不知道在他之前赫斯或者平斯克等人所做的一切。他是从自己特有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并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赫茨尔对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他不仅提出了到当时为止最完整、最有逻辑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制定了最详尽和最具可行性的行动计划，而且还亲自投入到将这一思想付诸实现的斗争之中。尽管在赫茨尔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已经萌生，但它们仍处于很朦胧和模糊的状态。赫斯、平斯克等人提出的建立犹太国家思想，既没有多少系统性，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和愿望。

第二，在赫茨尔的努力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政治运动。虽然在此之前，一些犹太人因不堪忍受日益加剧的反犹迫害，已开始了某些争取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包括建立自己的组织，集体向巴勒斯坦、阿根廷等地迁移等。但是，这类活动规模很小，只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赫茨尔四处奔走宣传，建立与各地犹太社团的联系，召开国际性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民族基金，终于使各地复国主义运动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一股国际性的强大潮流。

赫茨尔最大的成就是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纲领》，明确提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得到公认的、有法律保证的民族家园”。由于赫茨尔的政绩和威望，他在此次大会上被一致推选为第一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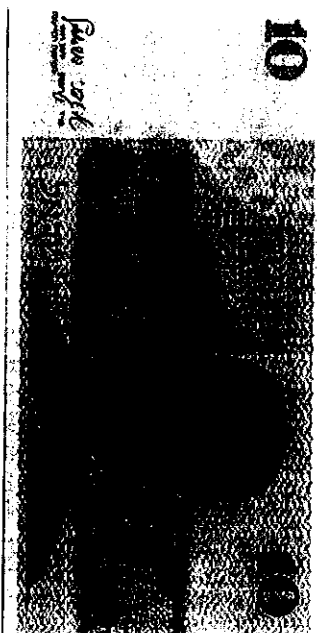
从1897年到1903年，赫茨尔组织和参加了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



1896年出版的《犹太国》封面

会，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使复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他自己也因积劳成疾，于1904年7月3日在奥地利去世，当时他只有44岁。由于赫茨尔对犹太民族的巨大贡献，他受到了犹太人的崇敬和爱戴，被尊称为犹太人的“新摩西”和“现代以色列之父”。1949年，即以色列国成立后第二年，赫茨尔的遗骸被从维也纳迁到了以色列。以色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把他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最高的一座山上，并把这座山改名为“赫茨尔山”。现在，赫茨尔山上还有埋葬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和烈士的国家公墓。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后，赫茨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公开这样说，我将遭到嘲笑，但可能在今后50年，无论如何，在今后50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历史惊人地证实了赫茨尔的预言，刚好50年后，这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诞生了。



以色列钞票上的赫茨尔

三、巴勒斯坦，还是乌干达？

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197名，分别来自东欧、西欧、北美和阿尔及利亚，其中来自俄国的代表就有90名。当赫茨尔出现在会议上时，受到了代表们极其热烈的欢迎，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在开幕词中

宣布，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为庇护我们犹太民族的大厦奠基”。他强调说：“我们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要寻求犹太问题的解决……我们与阴谋、秘密活动以及间接手段毫不相干，我们希望把问题置于自由的公共舆论监督之下。”

会议代表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三派：一是以赫茨尔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派”，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并建立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同有关国家进行交涉，取得合法的国



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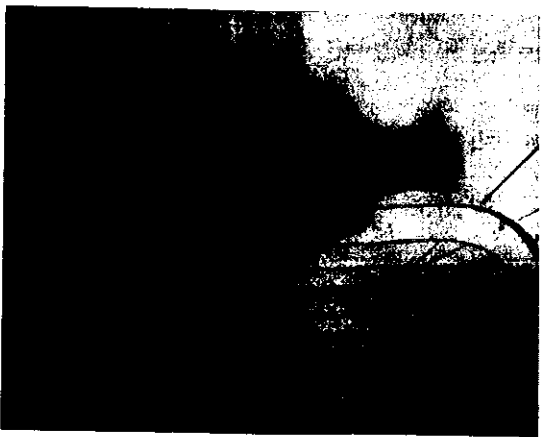
际保证；二是以“热爱锡安山运动”为代表的“行动派”，主张立即组织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造成既成事实，无需事先取得任何国家的同意；三是以阿哈德·哈阿姆为代表的“精神中心派”，主张将巴勒斯坦建成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中心，而不一定要建立一个具体的犹太国家。最后各派求同存异，通过了一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纲领》（即《巴塞尔纲领》），明确规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得到公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

为了实现复国运动的目标，《巴塞尔纲领》还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1. 有计划地鼓励犹太劳动者移居巴勒斯坦；2. 各国犹太人根据本国法律，联合起来组成紧密的团体；3. 提高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觉悟；4. 为得到各国政府对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支持而开展必要的工作。大会还决定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组织的常设机构在维也纳。凡年满18岁，赞同《巴塞尔纲领》，并缴纳一个谢克尔（古希伯来货币单位，相当于当时的25美分）的犹太人均可加入这个组织。大会还通过了犹太国歌和国旗的方案，讨论了建立一家银行，设立一项用以购置土地的民族基金，和创办一所希伯来大学等问题。

巴塞尔大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原先分散的、地区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大会之后，赫茨尔等人访问了巴勒斯坦，创办了犹太垦殖银行，建立了犹太民族基金，并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制度化，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巴塞尔大会之后的几年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迅速。1898年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时，代表人数增加到了400人，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小组也从117个增加到了913个；到1901年第五届大会召开时，出席的代表人数达到了600名，代表着世界各地的1572个犹太复国主义小组。此时，整个运动登记在册的成员已超过了10万人。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层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开展外交活动，寻求有关国家的支持。赫茨尔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他们求见德国皇帝、奥匈帝国苏丹、罗马教皇及欧洲各国的君主和政治家，希望得到他们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但这些活动没有产生多少效果。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俄国遭当局取缔，赫茨尔还到圣彼得堡与俄国政府代表见面，向其解释该运动的立场，同时请求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境遇。在许多人的看来，这些散居各国的犹太人，既没有共同的地域，也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互相之间在思想、文化、生活习惯上差别极大，就像一盘散沙，他们居然想要建立一个国家，这听起来就如同天方夜谭一样离奇。不少人把犹太复国思想看作是一种狂人的幻想，往往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并没有气馁，仍执着地寻找着机会。

赫茨尔本人先后拜会了奥匈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及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等人，希望他们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德皇威廉二世多次接见赫茨尔，但却从未给予实质性支持。1901年5月，奥匈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接见了赫茨尔等人，但他却一口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并说“我宁可兵刃加身，也不愿意失去巴勒斯坦”。德国的暧昧态度和奥匈帝国的强硬立场使赫茨尔等人很失望，英国当局一开始对此也不热心。后来由于俄国和东欧的反犹运动使大批犹太难民纷纷涌入英国及英属殖民地，加上受以银行家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英国犹太社团的影响，英国政府才开



1898年赫茨尔亲自到巴勒斯坦考察

始考虑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犹太难民问题。由于英国是世界的头号强国，而且近代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反犹运动，于是赫茨尔等人便将活动的重点转向了英国。

英国开始时并不同意将巴勒斯坦作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地点，而表示愿意考虑让犹太人在英国的某个殖民地定居。由于当时东欧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急需寻找一块避难地，赫茨尔等人便倾向于选择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或者西奈半岛建立民族家园。但英国认为塞浦路斯岛上已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居住，不能将他们赶走，表示可以考虑西奈半岛的阿里什地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此还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前往西奈半岛，但这一计划最终也因埃及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在此情况下，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可以将英国在东非一块被称为“乌干达”的保护地划给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这一方案因此被称为“乌干达方案”。

乌干达方案被提交给1903年8月举行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讨论。赫茨尔试图说服大会接受这一方案，并解释说它仅仅是一个解决犹太难民的暂时性应急措施。来自英国的赞格威尔等人主张接受这一方案，他们强调，重要的是犹太人有一块安身之地，至于这个安身之地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但来自东欧和俄国的代表们却拒绝考虑巴勒斯坦以外的任何地方，认为这是对《巴塞尔纲领》的背叛。后来，当大会以295赞成、178反对、98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前往东非进行实地调查时，全体俄国代表退出了大会，以示抗议。赫茨尔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和东欧犹太人“脖子上套着绞索”，“却不怕继续受苦”而要拒绝乌干达方案。但他认为重要的是维护复国运动的团结，不因团结一事无成。赫茨尔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却仍

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在1904年5月举行的行动委员会上，为了维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赫茨尔表示不再坚持乌干达方案，并再次确认只有巴勒斯坦才是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唯一地点。他在致会议闭幕词时，激动地举起右手，吟诵《旧约圣经》中的诗句“耶路撒冷啊，我若是忘记你，就让我的右手变得麻木不仁”，发誓继续忠于《巴塞尔纲领》。此次会议后不久，赫茨尔便去世了。

1905年7月，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这次会议根据考察团认为东非不适于犹太人定居的报告，正式否定了乌干达方案。支持乌干达方案的赞格威尔等人宣布脱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重新建立了一个“领土主义组织”，致力于东非、南美等地的犹太垦殖活动。第七届代表大会还试图协调“政治派”与“行动派”之间的立场。由于赫茨尔几年来开展的政治外交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政治派”的影响有所下降，而“行动派”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中的地位上升了。

四、早期的犹太定居者

在罗马帝国之后，巴勒斯坦先后被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塞琉柱、欧洲十字军、马木路克等外来势力统治过。从16世纪起，巴勒斯坦便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也有一些较小的宗教社团，包括一些从事宗教研究、依靠慈善基金为生的犹太教徒。

在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统治之后，当年“流着奶和蜜”的圣地亚巴勒斯坦已变成了一块人烟稀少、经济凋敝、疾病流行的荒凉之地。1867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作为记者曾到过巴勒斯坦，他给人们描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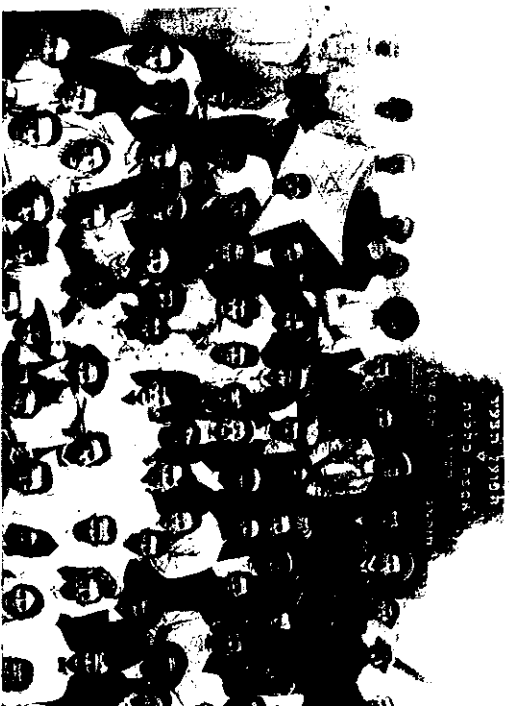
是一幅凄凉的图画：“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认为，巴勒斯坦当可首屈一指。那里的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丑陋。谷地是难看的沙漠，沙漠周围是一些孱弱的植物。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伤心和沉闷的土地。”

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自古代以来巴勒斯坦一直有犹太人居住，尽管16—17世纪时人数很少，大约只有3000—4000人。出于宗教原因，海外犹太人与耶路撒冷等地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时也有一些人从海外零星到圣地来定居。到1882年时，据估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约为30万，犹太人口约有2.4万。犹太人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萨法德、太巴列和希布伦这四个犹太教圣地，其中仅耶路撒冷就有约1.5万人。他们大都属于讲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信仰正统犹太教，对外部世界的一切事务都不关心。

自19世纪中期以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并进入了一个较活跃的时期。这其中，一些欧洲犹太慈善家的资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犹太金融家摩西·蒙特斐奥雷先后7次来到巴勒斯坦，并慷慨解囊，为当地犹太人修建了医院、学校、会堂。随着耶路撒冷古城内变得越来越拥挤，1860年一些犹太人在蒙特斐奥雷等欧洲富人的资助下开始在旧城墙外的西面新建住宅，这里后来发展为耶路撒冷新城。一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于1878年在雅法附近购买土地，建立了第一个近代农业定居点——佩塔提克瓦（希伯来文意为“希望之门”）。虽然此次试验并不成功，但激发了东欧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开发农业的热爱锡安山运动，并导致了第一批东欧犹太人前来定居。

1882年7月，热爱锡安山运动中一个叫作“比路”组织的15名成员从俄国来到巴勒斯坦。“比路”是《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诗“雅各家啊，来吧，让我们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希伯来文首字母的拼写。据估计，“比路”当时大约有520名成员，主要是受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第一批移居者到达后，开始是到米克维农业学校居住，后来又到农业定居点从事农业劳动。不久后，又有数百名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热爱锡安山运动成员也来到巴勒斯坦，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农业定居点。

这种因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运动被称为“阿里亚”，其希伯来语的意思为“上升”，也就是说当犹太人从流散地回到圣地定居后，其精神和肉体都得到了“升华”。这一期间的移民运动因而也被称为“第一次阿里亚”。在从1882年到1900年的近20年里，大约共有2.5万犹太人从俄国和罗马尼亚等地移居巴勒斯坦，使这里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5万人。此外，这一时期还有1000多名也门犹太人前来巴勒斯坦定居，他们主要是听到有关犹太慈善家在这里购买土地，免费提供给犹太人的消息而来的。



早期的犹太定居者

这些脑子里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祖亚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开始屯垦。第一批移民在犹太民族基金的帮助下购买土地，垦荒拓殖。定居者得到的土地往往都非常贫瘠，有的地方是沙漠，有的地方是沼泽。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来到后，只能住在简陋的帐篷或棚屋里，他们不但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要同疾病、饥饿、毒虫野兽作斗争，还面临着许多其他困难，如缺乏劳动经验和技能，土耳其当局和当地阿拉伯人的敌意等等。流行的疾病和肆虐的蚊虫使不少人丧失了生命。到19世纪末，多数定居点在经济上都陷入了困境，只得靠慈善基金勉强维持生活。在一个时期里，定居者们情绪低落，一蹶不振，移出者的人数超过了移入者的人数，最后剩下的人寥寥无几。第一次阿里亚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活动仍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中激起了对巴

巴勒斯坦的广泛兴趣。

1903—1907年俄国反犹浪潮再度高涨，又有大批犹太人向国外逃亡，他们中的大多数去了美国和西欧，也有一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1904—1914年间，有3.5万—4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批移民的到来被称为“第二次阿里亚”。从1882年到1914年的两次阿里亚，先后大约有6.5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了大约8.5万人，与当地阿拉伯人口（44万）相比虽然仍居于劣势，但这些人都是意志坚定的复国主义者。

与第一次阿里亚不同的是，第二批阿里亚的移民主要来自沙皇统治下的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而且他们多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除了逃避迫害的自身考虑外，更多的还是出于犹太民族解放和复兴的理想。另外，这批移民中还有许多人在东欧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平等、公正和没有剥削的犹太民族家园。在他们的影响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

显的社会主义色彩。一些定居者们提出了“劳动征服”的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他们用高价从土耳其和阿拉伯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了一些荒地、沙漠以及疟疾盛行的沼泽地，然后抽干沼泽，改良土壤，引水灌溉，建立起新型农业定居点。

一方面受社会主义和劳动征服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接受了第一次阿里亚失败的教训，一些年轻的移民们便组织起来，以共同劳动和集体生活的方式定居。1909年，第一个这样的集体农业定居点——德加尼亚基

布兹（kibbutz）在北部的太巴列地区出现了。出生在这个基布兹里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摩西·达扬，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希伯来语“基布兹”的意思就是“聚集”或“集体”，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基布兹里，一切财产均为集体所有，其内部没有货币往来，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在一起生产和生活，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有人称，基布兹是“小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到1914年为止，巴勒斯坦一共建立起了12个基布兹，它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贝尔福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奥同盟国一方，同英法俄等协约国家作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认为，如果能同有望获胜的一方建立起良好关系，战后就可以得到该方的支持，推进在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但是，究竟哪一方最后能获得胜利，当时是难以预测的。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就出现了亲德和亲英两派。

以弗兰茨·奥本海默为首的亲德派认为，德国发动的是一场“神圣的自卫战争”，德—奥同盟将最终战胜反动、残暴、黑暗的沙皇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德国合作，不仅可解救受沙皇政府迫害的俄国犹太人，而且还可得到德国及其盟国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事业的支持。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发表声明，支持同盟国一方，甚至号召犹太青年参军服役。但德国政府在两个问题上却使奥本海默等人很沮丧：一是它始终没有正式发表一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声明；二是它也并未真正致力于解放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



一位基布兹成员在采摘柑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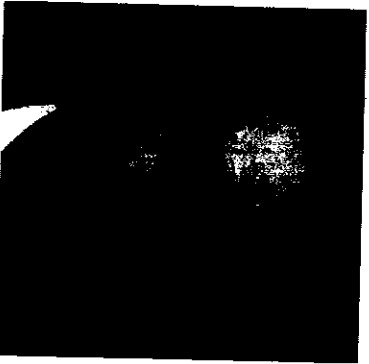
以哈伊姆·魏兹曼为代表的亲英派则认为，英、法等协约国家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巴勒斯坦未来将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该同协约国合作，应依靠英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开始时，亲英派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属于少数派。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委会的6名成员中，有3人为俄国籍，2人为德国籍，1人为奥地利籍。魏兹曼等人的意见不仅受到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而且也得不到多数俄籍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同德国、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后，会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处境更糟。直到对德外交碰了钉子，以及随着战局的变化，亲英派的影响才逐渐上升。

魏兹曼出生在俄国，成长在波兰，青年时即前往德国留学，毕业后一度在瑞士日内瓦大学任教。他1904年初移居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讲授生物化学，1910年加入英国国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在英国生活了10年。早在德国留学时，魏兹曼就因受赫茨尔《犹太国》一书的影响，成了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多次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移居英国之后，他成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魏兹曼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了扩大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他在英国广交朋友，同许多重要的政界人士建立了联系。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该争取英国的支持，因为一方面近代以来英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反犹活动，英国犹太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已开始有人担任政府要职；另一方面英国将在大战中获胜，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政府将能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提供极大的帮助。他还认为，

要得到英国的支持，就必须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同英国的战略利益相一致。1914年10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毫不怀疑我的看法，那就是巴勒斯坦将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是埃及的自然延伸，是苏伊士运河与黑海及可能来自那个方向的敌对势力之间的屏障，……如果我们的情况稍有好转，就能



哈伊姆·魏兹曼

够比较容易地在以后50年到60年中向巴勒斯坦移入100万犹太人，这样英国将有一个有效的屏障，而我们也将有一个国家。

魏兹曼先后结识了英籍犹太人、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英国军需委员会主席劳合·乔治以及后来出任外交大臣的亚瑟·贝尔福等政界要人。在他的影响下，这些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同情或支持态度。一战爆发后，魏兹曼应劳合·乔治邀请主持英国海军部研制新炸药的工作，成功地发明了丙酮生产新工艺，为制造新炸药（也被称为无烟炸药）解决了关键性难题。这极大地密切了他与英国官方的联系，为争取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1917年2月，英国内阁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和著名犹太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两名成员。会议决定，将由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保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与英国进行合作。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魏兹曼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多次协商，并频繁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希望英国政府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正式表示支持。魏兹曼等人还与美国犹太社团联系，希望他们支持由英国来保护巴勒斯坦，为英国夺取巴勒斯坦制造舆论。

1917年7月，应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曾任海军大臣，与魏兹曼有不错的私交）的要求，魏兹曼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提出了一个草案，供英国内阁讨论。10月，英国内阁在征求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意见之后，决定正式发表一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宣言。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以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了如下宣言：

外交部，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向您转达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这个宣言已提交内阁，并得到内阁的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因

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一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十分感激。
德诚挚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全文除去抬头和落款只有三句话，共125个英文单词，但对中东历史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这个宣言的发表，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塞尔大会20年之后首次得到了一个大国的正式支持。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nd, 1917.

Dear Lord Rothschild,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The Ministr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u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accorded by law to any other communit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Arthur James Balfour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宣言》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发表，前后经过了近一年时间。

其间经过几次起草、修改，英国内阁三次开会讨论，并征求了美国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意见，最后才发表的。该宣言的内容后来也被包含在一战结束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中。英国为何要发表这样一个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宣言呢？一般说来，可以从英

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当时的策略需要两方面来分析。

英国一直想趁奥斯曼帝国瓦解之机，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勒斯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不但能使苏伊士运河东面有一道可靠的屏障，而且还可加强英国在地中海东岸的战略地位。只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国便能以帮助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为理由长期占领巴勒斯坦，同时也可在中东地区培养一支能为英国所利用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英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从当时的需要来看，英国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可以争取到世界各国犹太人对英国的支持。到1917年，大战双方都因人力、物力消耗惨烈，引起国内危机，双方都想尽快打败对方，结束战争。当时俄国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很有可能要退出战争。英国想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争取俄国境内人数众多的犹太人，使俄国继续留在协约国中进行战争；同时也可争取势力很大的美国犹太社团的支持。当时，德国也在作争取世界犹太人的努力，如果英国不抢先发表支持犹太宣言，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入德国人的怀抱”。

除了以上两方面主要的原因外，促使《贝尔福宣言》的问世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魏兹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积极奔走活动，当时英国内阁中劳合·乔治、贝尔福、塞缪尔等决策人物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个人感情，美国政府的赞同态度，法国、德国的竞争等等。魏兹曼与贝尔福有不错的私交。据说，有一次贝尔福问魏兹曼，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关注的中心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别的地方。魏兹曼回答说，只有巴勒斯坦才与犹太人有真正的历史联系，其他地方都只是暂时的居住地。他反问道：“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将它换成巴黎一样，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魏兹曼博士，可伦敦已经是我们的了。”魏兹曼回答说：“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努力和不断追求的结果。用魏兹曼的话来说：《贝尔福宣言》是经过“两千次登门拜访才得以问世的”。尽管《贝尔福宣言》中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犹太国家”，而是说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但对于英国和犹太复

国主义者来说，“民族之家”就是犹太国家的代称，双方对此实际上都心照不宣。

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宣言的发表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得到了一个西方大国的正式承认和支持，为此后国际社会对它的承认奠定了基础。宣言的发表，也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给这一运动带来了新的声誉和动力。同时，它也使魏兹曼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使该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以，后来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在他写的《犹太史》一书中说：犹太民族事业的“真正的转折是在1917年，而不是在1948年”。

但是，这个宣言却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益。当时巴勒斯坦约有70万阿拉伯居民，拥有当地97%的土地，而宣言仅以“非犹太社团”一笔带过。英国在起草和发表宣言时，既没有征询当地阿拉伯人的意见，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这是非常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也为日后巴勒斯坦犹、阿两个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埋下了祸根。

六、“犹太民族家园”

魏兹曼等人深知，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了《贝尔福宣言》，但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目标还很远，他们还有许多路要走。魏兹曼说：“缔造一个国家绝不靠一纸决议，而只能通过一个民族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即使各国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国家，那也只是一种字面上的礼物。只有犹太人到巴勒斯坦亲自去建设它，犹太国才能成为现实。”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到一个月，英军就在艾伦比将军的率领下

从埃及攻入巴勒斯坦，并于1917年12月占领了耶路撒冷。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向协约国投降。此后，巴勒斯坦就完全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

此时巴勒斯

坦共有大约8.5万犹太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还有一个人（主要是正统派犹太



伊休夫的女基布兹成员在接受军事训练

教徒）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建立犹太国家是违背犹太教义的。所有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统称“伊休夫”，意为犹太社团。英国当局承认1920年成立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委员会为伊休夫的代表机构，由其处理伊休夫内部的日常事务。另外，犹太社团还有首席大拉比和拉比法庭，处理社团内的宗教事务。英国当局把希伯来语同英语、阿拉伯语一起规定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这样，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自治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1929年的第16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了魏兹曼等人的提议，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中各占一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是犹太办事处的当然主席。由于犹太办事处吸收了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参加，所以能广泛地联合各界犹太人，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从1929年到1948年，犹太办事处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购买土地、安置移民、组织军事防卫、促进犹太社团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上起到了巴勒斯坦“犹太政府”的作用。

大战一结束，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运动便又开始了，并很快

出了一个不高潮。一批又一批犹太人从东欧等地出发，到东南欧后再乘船来到巴勒斯坦。仅在1919年一年里，到达巴勒斯坦的移民就达7000多人。从1919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的移民都有8000多人，三年共有大约3.5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一次移民小高潮被称为“第三次阿里亚”。这批移民的特点是普遍比较年轻，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大多数都先在基布兹中定居，然而才逐渐进入城市。他们的到来，使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上了较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批人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了犹太工会和工人党的骨干和领导人。

前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数在1923年平稳了一段时间后，到1924年又迅速上升。1924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1.3万人，1925年更是高达3.4人，1926年下降到1.3万，1927年进一步减少到3000人。所以1924—1927年的移民运动被称为“第四次阿里亚”，这一期间前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多达6.5万人。这批犹太人主要来自波兰，受波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他们原来希望移居美国，但美国却在此时开始限制犹太人移入，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转而前来巴勒斯坦。第四次阿里亚结束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超过了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原来不足10%上升到了17%。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27年第四次阿里亚之后，犹太移民运动进入一个低潮时期。1928年移入的人数只有2178人，还没有当年移出的人多。但从1932年开始，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数突然开始猛增，突破了1万人，是上一年的一倍多，这种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1939年。后来人们便把1932—1939年这一时期称为“第五次阿里亚”。

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主要是因德国和欧洲各地出现了新的反犹浪潮。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德国不但通过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将他们从许多行业中排挤出来，向他们征收罚款，后来又进一步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他们关押到隔离区和集中营。犹太人不堪忍受纳粹当局的迫害，纷纷逃离德国和欧洲，涌向巴勒斯坦。1933年、1934年来到巴勒斯坦的中欧犹太人分别有3万多和4万多。1935年的移入人数竟高达

66400人。1936年以后，由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犹太人移入的起义，英国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移入实行限制，移民人数开始下降。但在1936至1939年的三年中，每年通过合法和非法渠道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多达2万人左右。第五次阿里亚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有23万~25万人，超过了以前几次阿里亚移民人数的总和。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就达到了45万，占巴勒斯坦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犹太民族家园”已初步形成。

第五次阿里亚前期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多数是德国和波兰犹太人，另外也有一部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的犹太人。他们中除了有一批富裕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外，还有许多教授、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等专业人才。他们不仅带来了一大笔资金，而且还带来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科学、教育、文化、贸易、工业等方面加快了伊休夫的发展。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主要是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犹太拓殖基金会”两个机构进行，基金的来源主要靠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1921年到1939年，犹太社团从阿拉伯人手中购得的土地共为84.4万杜纳姆。加上在此之前已获得的土地，犹太社团占有的土地已达150万杜纳姆，占巴勒斯坦的土地总面积的5%。尽管在这一期间犹太人占有的土地增加了一倍，但其人口却增加了近八倍。因此他们认为，还应该获得更多的土地，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犹太社团还发展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有了火柴、水泥、烟草、石油、纺织、金属加工、电力等企业。约旦河水被用来发电，死海的矿藏也得到了开发。到3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工业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从20年代后期起，犹太移民呈现出一种城市化的趋势，四分之二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里。到30年代末，特拉维夫的人口增长到了近15万人，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纯犹太人城市”。

犹太民族历来很重视教育。伊休夫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初、中、高级教育体系，后来又发展起了农业、师范等职业教育结构。1918年7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仍在继续时，巴勒斯坦的第一所高等学



1925年4月1日，希伯来大学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奠基

国家之前，所以许多人说，犹太人还没有自己的国家时，就有了自己的大学。

此后，在海法的工程技术学院、在雷霍沃特的西埃弗研究中心也相继建成。希伯来语作为犹太社团的正式语言，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特拉维夫出版了几种希伯来语报纸，时常上演希伯来语戏剧，并产生了一批希伯来语作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有了完善的教育、医疗、文化、福利等公共服务体系，成为中东地区最富有活力的社区，其社会经济水平远高于中东其他地区。

20世纪初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一形成，就带有较强的劳工运动的色彩。1930年劳工联盟同青年工人党合并，组成了巴勒斯坦工人党（简称马帕伊，Mapai）。该党成立初期约有5600名成员，主要的领导人是原青年工人党领袖阿尔洛索罗夫。当他在1933年被人暗杀后，原劳工联盟的领袖本-古里安便成了巴勒斯坦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除了劳工政党外，还有许多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个人和组织，这些人被称为“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由于人多势众，巴勒斯坦工人党在伊

校——希伯来大学就在耶路撒冷城东的斯科普斯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7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希伯来大学正式建成开学。第一届

董事会成员中包括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犹太学者：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哲学和神学家马丁·布伯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化学家哈伊姆·魏兹曼。他们给希伯来大学确定了三个目标：一是要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二是要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创建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将其建成一所犹太人的大学。因希伯来大学建立在以色列

休夫中一直保持主导地位。1933年，在犹太民族委员会的71个席位中，巴勒斯坦工人党就占了31席。

随着同当地阿拉伯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犹太社团的防卫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休夫以早期定居者们的民兵组织为基础，吸收了一些战时参加英军作战的犹太大军团退役军官，组成了一支有几百志愿兵的防务队。1920年6月，劳工联盟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希伯来语意为“自卫”）。最初哈加纳只是一支松散的地下武装，由志愿人员组成，其成员零星散布在各基布兹中，在遭到阿拉伯人攻击时才拿枪自卫。1935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的修正派独立出来后，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伊尔贡—茨瓦伊—柳米”（意为“民族军事组织”，简称“伊尔贡”）。伊尔贡成员多数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这支右翼部队在作战时比哈加纳更主动，在遭到阿拉伯人进攻时，不是像哈加纳那样仅限于自卫，而是凶狠无情地到敌人的村庄中发动反击。

至此，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成了一个十足的“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政府”——犹太办事处，有自己的经济体系——犹太总工会下属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众多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军队”——哈加纳和伊尔贡。

七、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产生时，它的倡导者们对巴勒斯坦几乎完全一无所知。不少人认为犹太人回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回到一片没有民族的土地”。据说，当第一批移民1882年在“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支持下来到巴勒斯坦时，他们竟吃惊地发现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了。这些人就是当地的阿拉伯人。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周边民族的迁入和本地居民的阿拉伯化，巴勒斯坦逐渐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也成了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大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英国建立委任统治后，1922年按宗教信仰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约为75.7万人，其中包括59.1万穆斯林，7.9万基督教徒，0.7万德鲁兹派教徒，8.4万犹太人。由于自然增长率较高，加上不断有来自周边的移民，阿拉伯人口增长较快，1931年时已达到85万，到1939年底便超过了100万。在南部沙漠地区，还生活着约10万游牧的贝都因人。

英国在发表《贝尔福宣言》时，也没有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只在宣言中以“非犹太社团”一笔带过。宣言正式发表之前，英国曾将起草的文本送交犹太人代表和美国政府征求意见，而当地阿拉伯人却被蒙在鼓里。英国政府这种无视阿拉伯人权利的做法，是造成后来犹太—阿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英国曾向阿拉伯人解释说，《贝尔福宣言》与英国早先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并不矛盾，犹太“民族家园”不会损害当地阿拉伯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魏兹曼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也曾前往埃及和巴勒斯坦，会晤了包括后来成为叙利亚国王的费萨尔等阿拉伯领袖和精英，争取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费萨尔甚至还与魏兹曼签署了一项协议，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犹太人则承诺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但《贝尔福宣言》却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对，因为一批又一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使他们



1919年1月，魏兹曼（左）与阿拉伯领袖费萨尔签署协议，对对方的政治活动予以支持。魏兹曼身穿阿拉伯长袍以示友好

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认为，费萨尔等阿拉伯上层并不能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真正受到犹太移民影响的，是巴勒斯坦当地的普通阿拉伯民众。

1919年1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发表声明，宣布拒绝《贝尔福宣言》和“魏兹曼—费萨尔协议”。1920年春，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举行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行，进而发生了阿拉伯人袭击该城犹太居住区的暴力事件。1921年5月，在雅法又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的暴力活动，双方再次发生冲突，造成了95人死亡，220人受伤的惨案。最激烈的流血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这次暴乱的起因是阿—犹双方为争夺耶路撒冷的“哭墙”，狂热的宗教情绪发展为暴力冲突。骚乱很快就波及全国，双方在各地互相袭击，伤亡甚众。英国当局从埃及和约旦调来军警进行镇压后，才逐渐控制了局势。在此次骚乱中，犹太人有133人死亡，339人受伤；阿拉伯人方面有116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1930年，一个英国派出的调查委员会提出，如果犹太移民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乃至停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但立即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英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对其进行批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当英国重申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时，又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就这样在阿—犹双方的反对声中左右摇摆，进一步刺激了暴力活动的蔓延，使英国的委任统治日益陷入困境之中。

由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反犹活动升级，1932年起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开始急剧上升，1935年多达6.6万多人。潮水般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使本来就紧张的英—犹—阿三方矛盾更趋尖锐。

年份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人数	4,075	12,553	37,337	45,267	66,472	29,595	10,629	14,675	31,195

1936年4月，巴勒斯坦多地发生了阿拉伯人有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犹太人方面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流血事件不断

发生。当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各派政治力量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表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开始联合起来，开展有组织的反英和反犹太斗争。这个委员会一成立，便宣布在巴勒斯坦全境实行总罢工。委员会还正式向英国当局提出，要求立即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禁止向犹太人出卖阿拉伯人的土地，结束委任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立宪政府。

当英国方面拒绝了阿拉伯人的要求后，罢工发展成了大规模武装暴动。阿拉伯武装人员不仅袭击犹太人，而且也将英国统治当局作为打击目标。他们袭击犹太定居点及英国驻军和警察，破坏公路、铁路和输油管道。哈加纳和伊尔贡等犹太武装也不断进行反击和报复。由于大罢工和武装冲突，整个巴勒斯坦陷入了瘫痪状态。



1938年，犹太武装对阿拉伯人的攻击进行报复

英国当局则实行宵禁，进行突击性大搜捕，将大批“暴乱分子”关押进拘留营，并从英国、埃及等地调来更多英军，加强对阿拉伯暴力活动的镇压。哈加纳、伊尔贡等犹太武装在英国的默许下，也不断扩充人员和武器，针锋相对地同阿拉伯人进行交战，并趁机抢占地盘。小股的

阿拉伯武装活跃在巴勒斯坦各地农村，袭击犹太人和英国军警，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流血恐怖事件和暴力活动充斥于整个巴勒斯坦。在英军和犹太武装的联合打击下，到1939年初，阿拉伯暴动逐渐平息了下来。在1936—1939年的动乱中，死伤的英国人有700多名，犹太人1200名，而被打死的阿拉伯人却多达4000~5000人。

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一）英国政府声明“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二）英国的目标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三）五年内只允许犹太移民75,000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四）英当局将限制并禁止土地转让。

这个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也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改变，实际上已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尤其对犹太移民和犹太人获得土地的限制，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将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永远处于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最终将葬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国当时之所以下决心调整政策，主要原因是在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必须保持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因此需要中东各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和支持。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在大战中同英国合作，英国就不得不以牺牲犹太人利益的做法来达到此目的了。

自然，犹太人坚决反对英国的这个白皮书。这样，巴勒斯坦原先的犹—阿冲突、阿—英冲突就让位给了犹—英之间的激烈冲突。